

[本文原编者按]经过几年的筹划和努力,在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推出百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精选百余位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述,系统出版。作为中国基督教著名思想家和活动家,吴耀宗先生的著述将单独成卷,这是吴耀宗先生的著述1949年后第一次由出版社公开出版,意义重大。本文是编者撰写的导读,特别刊发。

## 作为基督教思想家的吴耀宗

赵晓阳

进入21世纪的我们,要探讨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或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探讨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或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对中国教会或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吴耀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人物。他以其富有远见和现实性的基督教思想,以其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高度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

吴耀宗,英文名Y. T. Wu,祖籍广东顺德。1893年11月4日,他出生于广州的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中,父亲吴逢敬是一位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吴耀宗是第一代基督徒。早年在广州私塾及育才学校求学,1908年北上京城,在北京税务专科学堂读书,对当时的人来讲,任职海关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上学期间,因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而接触到基督教,开始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途。1913年,吴耀宗毕业于北京税务专科学堂,先后在广州、牛庄(今

营口)等地的海关工作,1917年任职北京总税务司。1918年1月,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查经班中,读到《圣经》中的《登山宝训》篇章,深深被耶稣的道理所吸引,6月,吴耀宗在北京基督教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

1920年11月,不顾亲友的强烈反对,吴耀宗辞去待遇优厚的海关职务,来到薪水只有海关三分之一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任校会部学生干事,负责基督教学生运动,从此开始了他服务基督教和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一生。1924年至1927年,在基督教青年会资助下,吴耀宗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其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詹姆斯的宗教信仰的教义》(William James's Doctrine of Religious Belief)。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1927年,吴耀宗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回国,赴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校会部主任干事。因工作之便和职责要求,他经常与各地青年学生接触,其思想也与各种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潮动向和时代走向紧密结合。1937年再次赴美演讲,1938年归国后,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干事,直至1950年。

除服务青年会、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外,吴耀宗还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基督教团体的活动。1914年,英国基督教贵格会传教士霍德进(H. T. Hodgkin)等和平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因他曾在四川传教,其组织于192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唯爱社。吴耀宗深受唯爱主义影响,亲自起草中文成立宣言书,协助主编《唯爱》杂志,倡导和平运动,并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他还深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并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于1938赴印度玛德拉斯参加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会议之机,当面敬赠甘地,并就非武力主义如何应用于国际问题进行请教。他曾多次表述,甘地是他最尊敬崇拜之人。

虽然吴耀宗一生都在青年会和基督教会里工作，尤其熟悉学校青年会工作，对青年学生格外重视，但他从来不以基督教会自限，生活思考在一个特殊阶层里。他十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世纪30年代后，他先后参加了李公朴、阎宝航等组织的“东北社”，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宋庆龄等人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团体，利用青年会与青年学生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1936年底，吴耀宗先后在美国44所大学演讲123次，听众达25000人，呼吁美国及国际力量制裁日本侵华，为营救“七君子”组织国际支援。

1938年，吴耀宗还参加了许广平、胡愈之、郑振铎等民主人士在上海组织的“星二座谈会”，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出资组织了“复社”，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和《鲁迅全集》。1946年，他与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等11位社会贤达，作为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的代表成员，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特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呼吁和平，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英文备忘录，并当面交给马歇尔。他一直高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的认识和远见，使他获得了“午夜钟”的名号。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负责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领导开展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之后，他还历任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局主席等职，曾任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委、委员等职。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86岁。

## 二

吴耀宗一生都高度重视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他始终积极参与各

个时期的基督教刊物的创建、组稿和撰写工作，民国年间著名基督教刊物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都可以看到他积极的身影和努力成果，这一切成为今天研究吴耀宗的文献基础。

1919年，他与在北京的中外基督徒徐宝谦、刘廷芳、步济时(John S. Burgess)、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组成了“北京证道团”(后易名“生命社”)，创刊出版了《生命月刊》，以“阐发基督教之真理实力，藉以促起学生个人及团体根本上之觉悟”为宗旨。吴耀宗任月刊的编辑委员，并积极撰文。他还与胡学诚、吴雷川、李荣芳、刘廷芳、彭锦章、宝广林、张钦士等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了“真理社”，以研究教会及国家问题为主，倡导基督教“文字本土化”。1923年4月出版《真理周刊》(后改为半月刊)，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宣传基督教，他也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筹组工作，在《微音》、《华年》、《中国学运》及 *Student World* 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成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推动者。1945年，他还在成都创办了以关注基督教与现实为主旨的《天风周刊》，后移至上海。该杂志存在至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刊。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为数极少的自立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的当家人，吴耀宗还主持、策划、撰写、编译了多部系列书籍。20世纪30年代，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青年丛书”50种、“社会问题小丛书”20种、“宗教问题小丛书”20种及“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书”10种等，多达百本的系列丛书。今天看来，其中多本著述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本土化探讨的先驱之作。20世纪40年代，他还顺应20世纪基督教会合一主流，促成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超宗派联合——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战争特殊困难条件下，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生存困难和相互沟通问题，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在更大范围的超宗派联合工作的方式，提供了样板。

吴耀宗不仅从事出版编辑工作，自己终身也笔耕不辍，积极撰写

和编译了大量文章和书籍，涉及中国基督教会、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督教与政治等广泛的主题。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实际问题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作品，这些包含着强烈社会关怀和神学视野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经典。

吴耀宗著述颇多，从语言角度可分为中英文两大类，据笔者的初步估计，其中文著述约 150 万字，英文约 20 万字。英文文章主要发表在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督教会《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和《中国基督教年鉴》(*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上，中文文章除在《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天风》、《消息》、《青年进步》、《唯爱》、《华年》、《微音》、《中国学运》、《基督教丛刊》、《协进月刊》这些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外，还在《民主周刊》、《世界知识》等社会性刊物发表，表达他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和对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社会改造的各种思考和呼吁。他还将这些长短不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论著，结集成书出版，如《社会福音》(青年协会书局 1934 年出版)、《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 1949 年出版)、《基督教讲话》(青年协会书局 1950 年出版)等。其中部分曾多次再版，成为一时之名品和精品。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曾在《基督教丛刊》上系列连载刊登，1943 年合印单行本出版，1944 年再版，1946 年第 3 版，1946 年 10 月第 4 版，1948 年 7 月第 5 版，1948 年 10 月第 6 版。该书是吴耀宗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作，亦成为 20 世纪最著名的神学著作，旨在通过探讨上帝信仰的存在，进而在理论层面上调和上帝信仰与唯物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吴耀宗唯一一本系统性的专著。

此外，吴耀宗还出版了《中国青年出路问题》(青年协会书局 1935 年出版)、《大时代的宗教信仰》(青年协会书局 1938 年出版)、《大时代中的上帝观》(青年协会书局 1940 年出版)等。翻译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科学的宗教观》(青年协会书局 1936 年初版，1948 年再版)。

## 三

吴耀宗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他青年时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一次最根本的大转变,确定了他一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相信基督教是因为“登山宝训”的内容打动了,让他看到了一位平易近人的耶稣,丝毫不沾染任何的神秘色彩。他非常注重自己的重生得救经验,在多次的演讲和文章中都曾提到。从他众多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握了基督教信仰的两个基石:上帝的存在和祈祷的意义。

第二次转变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他“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但第二次的转变并不否定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有所深化,有所发展。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对基督教的信仰,直到1979年临终时,还是笃信基督教,热爱教会,还要求抱病去参加上海沐恩堂的复堂感恩礼拜。

吴耀宗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就从《圣经》中,特别是从耶稣的教训、行动中,从他的受害牺牲,看到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最高的原则。吴耀宗在以后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六十年的经历中,一直为这个理想和原则而奋斗,奉献他的一生。他始终既忠于他的宗教信仰,忠于他所认定的真理,又不违爱国的天职,不违他对上帝、对教会、对社会、对祖国所抱的托付。在几十年社会变革的大风大浪中,他不断前进,修正他对斗争方法的理解,到临终时他仍然没有放弃爱的理想和信念。

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过程,首先是早年对唯爱主义的热衷。唯爱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种和平主义思潮,主张以爱为对人、对事的最高原则,反对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刚刚信仰基督教的吴耀宗,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接受基督教之后,就认为要做一个真正、彻底的基督徒,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照着基督的“登山宝训”去做。他在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之时,以极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才智,写了大量的社论、通讯、讨论和答辩,刊登在《唯爱》上(1931年第1期至1935年,共17期),从中可

看出他坚定信仰的彻底性。

随着抗日救国的时局变化，面对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是奋起和爱国同胞抗战杀敌，还是坚持唯爱主义，用和平的不合作方法救国，成为吴耀宗心中引起长期思想激烈斗争的矛盾。在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中，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淳朴的唯爱主义到对日不合作，到理论上唯爱、行动上支持武力抗战，到与各界爱国人士并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因爱而用武力并不违背唯爱精神，到歌颂武力抵抗侵略，最终完成了艰难的政治思想（也是神学思想）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他的第二次转变。

1937年，他再次从纽约协和神学院留学回来后，于次年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这时美国基督教会的“基要派”和“自由派”神学激烈斗争即将结束。“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实际上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是否运用理性和现代科学的语言、观点介绍和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教义的冲突。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主义神学”和“社会福音神学”的大本营，吴耀宗留学纽约协和神学院，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深受其影响。他更多地接受了协和神学院主导的结合社会、应对现实的自由主义神学，更多地趋向于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神学。

社会福音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北美地区的基督教神学思潮，其宗旨是根据《圣经》中耶稣关于天国的教训，纠正当时流传于北美教会的“奋兴福音派”只注重个人灵魂得救、忽视福音的社会意义的偏向。社会福音的信息既继承旧约先知的传统，又根据耶稣自己的教训，在神学上完全是正确的，在释经学上也是无懈可击的，它在20世纪初是一股纠偏的神学思潮，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起源于拉丁美洲，影响遍及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学，从某些方面看，正是这个“循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生、发展和开花结果。

吴耀宗不是一位满足于玄思臆想的书生式神学家，而是投身于现实斗争，把信仰、思想和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大勇大智的先知式神学家。《圣经》中和历史上的先知都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他是一位十

分正直、信实、坦诚的人，一生强调并实践所信所想所行的一致性。从他的言论和文章，可以见到他的为人和内心深处，“他心里毫无诡诈”，以其行证其言。他毫不隐蔽他的信仰、思想、观点，勇于坚持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也勇于修正他已认识的错误，所以他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一生。

吴耀宗对中国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的思考与认识是另辟蹊径的、独具眼光的。他不是从“传统中国”作为出发点来思考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而是以“未来中国”作为他的思考基石。这一切使得他的政治思想和神学思考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更充满了批判性，而对这种批判性的认识可能是理解吴耀宗思想的真正关键点。我们从他早期的“唯爱主义”“社会福音”的主张可以看出，他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改变过以基督教信仰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想法和努力。他更信仰古代基督教所具有的解放大众的革命性，他更寄希望于基督教的永恒潜在原动力，更寄希望于基督教的觉醒，希望基督教也有能力充分觉醒，将自己的传教思想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从种种被扭曲的现状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体现基督教的价值，真正彰显耶稣所提倡的解放劳苦民众的福音。他这种具有相当“现实性”的基督观，把耶稣放回到当时历史和当前现实中的基督观，为当时的青年人指引了一个过去还不知其存在，更没有进入过，且具有相当吸引力的方向。这应该是他“午夜钟”名号的得来之由吧。

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两百余年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这点大概不会有争议。褒扬者称之为“中国教会的先知”、“爱国爱教的典范”、“解放神学的先驱”，贬损者则认为他是“异端”、“不信派”、“无神主义者”、“不属灵”、“青年会派”。不解者、误解者、曲解者则更是大有人在。作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对吴耀宗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对他的研究和关注仍然显得不是很充分，尤其大陆学界对他的关注更显稀薄。所有关注都局限于基督教三自教会和亲朋好友对他的回忆和纪念，仅有的一点研究也是立足于他与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发起，以及他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来展开的。这些关



注和研究远远缺乏将中国基督教史置于世界传教史场域的某种更为宏大的叙事框架，或不能更为立足于中国基督教史本身发展的角度、基督教中国化的角度来进行拓展和构架。

吴耀宗及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从客观上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使基督教开始脱离“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非西方教会即“第三教会”崛起的开启者，而非西方教会的崛起已经成为改变全球文化流向和宗教格局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教会的首创之功，实让处于“后进”的中国基督教会居于“领先地位”，这与吴耀宗是中西兼通的基督教学者，以及他与与时俱进的深刻反省与思考、紧密联系中国本土社会和教会的基督教实践有着密切关系。同今天拉丁美洲天主教的解放神学相比，虽然他在某些观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在方向上，肯定是第三世界神学发展的前驱。

#### 四

1950年前，吴耀宗的著述或单本出版，或将一段时间的论述以某个主题结集出版，大部分都再版多版，成为一时之名品或精品，也使他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尤其他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与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堪称那个时代最能代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三本书。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著述除发表在当时当年的杂志刊物外，再没有结集公开正式出版过。社会不曾遗忘吴耀宗作为中国近代基督教思想家的历史意义和贡献，本次入选“中国近代思想文库”，使其再次浮出水面，重新被世人所认知和理解。事实上，他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以一位“思想家”而非教会人物的定位，来直面他所生活的时代。1949年以后，他的这些思想得到了更多的实践场域。

相信随着本书的出版，作为中国两百余年基督教史上“最受争议”的人，对吴耀宗的研究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也会有助于深化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吴耀宗的更

多关注,能跳出中国传教史研究的“二元对立理解模式”(戴德生模式和李提摩太模式)。

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吴耀宗是为数不多的始终与社会保持联系之人,更是努力探索用基督教理论联系中国社会现实的人,认识和改革、改造社会与教会的人。笔者因前些年从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研究课题,得以更早认识到吴耀宗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的贡献和意义,更为今天有缘从事编撰吴耀宗文集而欣慰。

本文集以吴耀宗影响最大、最有思想代表性的文章组成,全文选入了《大时代的宗教信仰》(青年协会书局1938年出版)、《大时代中的上帝观》(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出版)、《没有人看见过上帝》(青年协会书局1943年出版)。其他文章选自《社会福音》(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出版)、《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出版)、《基督教讲话》(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出版),以及《唯爱》、《微音》、《女青年月刊》、《同工》、《华年》、《消息》、《天风周刊》、《新坛》、《联声月刊》、《协进月刊》、《民主周刊》等基督教或社会性刊物,再加上他的译著或他著写的序言。全书涉及吴耀宗各个历史时期的基督教思想或社会思想,如唯爱主义、社会福音和个人福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基督教与唯物主义、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基督教的改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本土化等众多方面。语言思想面向青年,文字流畅易懂。在编撰过程中,除将繁体字转为简体字,将明显的印刷错误和错别字纠正外,没有做任何修改。考虑本文集面向整个社会出版,读者可能不熟悉《圣经》,原文中的“马可”“林前”会修改为《马可福音》《哥林多前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